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NKI)来源集刊

韩国研究论丛

第二十七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2014年第一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CONTENTS

-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理论与实践探讨…………… 方秀玉 / 1
- 朴槿惠政府北极政策的解读与展望…………… 孙雪岩 王作成 / 15
- 朝核危机下东北亚区域公共产品的建设…………… 仇发华 / 28
- 21 世纪中美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互动的
新趋势…………… [韩] 孙霞丽慧 / 41
-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韩关系：模式、趋势和调适…………… 詹德斌 / 56
- 朝鲜共产党早期历史再述：国外篇
(1919 ~ 1924)…………… 沈志华 崔海智 / 71
- 西方传教士视域下的甲午中日战争“平壤战役”
——以《朝鲜丛报》为中心…………… 石建国 / 98
- “庚寅事变”始末之再考察…………… 刘 阳 金成镐 / 110
- 有关《李鸿章全集》中朝鲜巨文岛占领事件的史料
考订及其意义…………… 郭海燕 / 127
- 论朝鲜甲申政变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董顺擘 / 139
- 论明朝初期与高丽的女真之争…………… 郑红英 / 153
- 朴趾源的散文诗学与庄子美学…………… 郝君峰 / 168
- 从 16 世纪末中、朝士人的阳明学论辩看东亚儒学交流
——以许筠《朝天记》为中心…………… 王鑫磊 / 181
- 民主制度与民主政治文化的生成：韩国的案例…………… 郝诗楠 / 193

从 16 世纪末中、朝士人的阳明学 论辩看东亚儒学交流^{*}

——以许篈《朝天记》为中心

王鑫磊

【内容提要】发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逐渐发展成为东亚中、日、韩（朝鲜）三国共享同时又各具特色的思想资源。东亚不同国家同源而不同流的儒学思想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同时把握其共性和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儒学这一国际化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和力量。本文利用在朝鲜半岛留存的历史文献，对 1574 年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知识分子之间一次关于阳明学的论辩进行剖析，呈现了一段两国学者因儒学思想的差异而产生冲突、进行交涉的历史，提出通过不断交流达到相互受容，是寻求儒学普适性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东亚 儒学 阳明学 许篈 中朝士人论辩

【作者简介】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引言

从东亚视角来考察儒学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发源于中华传

* 复旦大学“985 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项目。

统文化的儒学，通过东亚地域间的国际交往和人员往来，借助东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书同文”的历史条件，逐步传播和影响到各主要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并最终发展成为三国共享的思想资源，同时又演化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16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和朝鲜半岛，会发现，在这个时期，就儒学发展而言，中国总体还处在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占主导的时段，但同时心学思想也因王阳明而正处在急速上升时期，大有与理学一争长短之势；而此时整个朝鲜半岛总的来说还处在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是理学一枝独秀垄断思想界的状况。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差异性，而差异点就在于阳明学的异军突起。那么当这种差异性在现实中产生了碰撞，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恰有一些异域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一 关于许筠及其《朝天记》

这里要提到的文献叫作《朝天记》，出自一个名叫许筠（1551~1588）的朝鲜士人之手。1574年，许筠作为朝鲜王朝派往明朝的使臣来到中国，回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书写整理成四卷本的《朝天记》，后收入其文集《荷谷集》中，故又称《荷谷先生朝天记》。熟悉朝鲜时期燕行文献的人都知道，这部《荷谷先生朝天记》可算是产生于明代的使行文献中内容最翔实、体例最完备的文献之一，而针对这一文献展开的研究也为数不少。

这部文献的作者许筠，也是一个颇值一提的人物。许筠，字美叔，号荷谷，出身名门，年仅18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生员试，22岁在科举考试中文科及第，后由朝廷“赐暇读书”，为出仕做准备。其间，他的表现在同期进士中堪称佼佼者，不仅经常与李珥、柳希春等当世大儒同在经筵论道，还曾在国王主持的一次试射中三中夺魁，可谓文武全才。^①1574年，朝鲜循例要向明朝派出圣节使（恭贺皇帝生日的使节），是年24岁的许筠主动上疏请求担任书状官（职责是记录使行经过并在归国后汇报）同行，获批前往中国。回国之后，许筠一度仕途亨通，先后担任吏曹佐郎、弘文馆校

^① 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1卷，韩国：探求堂，1963，第262页。

理、昌原府使等职。然而，1584年，朝鲜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弹劾李珥的党派之争，许筠因跟随其父立场（东人派）而成为弹劾派的先锋，站到攻击西人派李珥的第一线，这场政治斗争以东人派的失败告终，许筠也遭流放，尽管第二年他就被赦免，但已无心从政，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1588年，38岁的许筠因病卒于出游金刚山途中。^①

当时的朝鲜士人多为其英年早逝扼腕叹息，当时有评论称“筠聪颖强记，诗词艳丽，一代推为才子。故时人宗之曰：吾侪虽失李珥，有美叔在，何损焉？筠亦傲然自当，立帜攻珥，以至于败，谈者惜之”。^②许筠的学识得到当时世人的高度评价，还可从这样两个情节中得到证明：其一是李珥弹劾案结束后，李珥本人甚至还因可惜许筠的才华，而在国王面前为这个抨击自己最厉害的青年后学求情；^③其二是许筠曾作为朝鲜政府的代表接待过一位明朝来的使节黄洪宪（1582年），在交流过程中，这位黄太史对他的评价是“使此子生于中华，玉署金马当让一头”，^④意思是说他即使与中国的文人士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筠是朝鲜大儒柳希春的门人，柳希春精通经史，著述颇丰，尤擅理学，曾著有《朱子语类笺解》。师从柳希春的许筠自然是受到了极好的儒学训练，特别是对朱子学有极深的造诣。23岁时他就多次奉旨“入侍进讲”，与李珥、柳希春等一起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宣祖大王讲读诗书经籍。^⑤据其年谱记载，许筠著有《朝天记》《北边记事》《荷谷粹语》《仪礼删注》《夷山杂述》《读易管见》等书，^⑥还编有《海东野言》《伊山杂述》等，就其短暂一生来说实属多产。

许筠《朝天记》中大量有关阳明学的内容，几乎全部以许筠与中国士人笔谈的形式被记述，其中既有相对平淡的问答式对话，也有相当精深的学术性讨论。这些丰富而细节化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客观反映了阳明学在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在许筠接触过的中国士人中，有信奉阳明学

① 关于许筠的生平，参见〔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第485-486页。

② 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25卷，第544页。

③ 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21卷，第408页。

④ 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85页。

⑤ 见前引《朝鲜王朝实录》第21卷，第280、296、297页。

⑥ 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86页。

的，也有反对阳明学的，实际上是通过异国观察者的眼睛，为我们记录下明代中后期特定时段的学术生态场景。同时，这些材料也生动地呈现了一段中国和朝鲜半岛间儒学思想碰撞的历史，除了有关阳明学的内容，许篈和中国士人的交流还反映了其他一些与儒学传统有关的问题。尽管它只是很小的个案，但反映出来的是儒学在东亚两个国家各自发展流变、相遇冲突及寻求受容的大问题，这不仅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话题。

二 许篈与中国士人的交流

有韩国学者指出，王阳明的学说传入朝鲜相当早，大约在其《传习录》出版后的第三年（1521年），朝鲜就有了关于这部书的讨论^①，而此后阳明学说一直受到朝鲜士人的尖锐批判，尤以李滉为代表。然而这样一个批判的过程，反过来恰恰也造成了阳明学在士人间的广泛传播。正因如此，许篈在未出国门之前，就已经对阳明学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而他是坚定地站在“卫朱斥王”的立场上的。这一立场贯穿许篈与中国学者交流的始终，当碰到阳明学的支持者，对话往往会变得剑拔弩张、不欢而散，张崑将教授曾用“笔战”一词形容之，真是再恰当不过^②；而当遇到阳明学的反对者，许篈就会发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感叹。尽管这些交流并不都是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分析两国儒者因认识的差异而希望进行沟通的努力。

（一）正学书院阳明学笔战^③

许篈和中国士人的第一次阳明学笔谈发生在万历二年（157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许篈等人前往参观辽东正学书院，在书院的乐育堂休息时有四名生员前来相见，分别是贺盛时、贺盛寿、魏自强、吕冲和，许篈特别指出，那名叫作吕冲和的生员，乃是东莱先生吕祖谦（南宋著名理学

① 参见吴钟逸《阳明传习录传来考》，〔韩〕《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第67-86页。

② 参见张崑将《十六世纪末中韩使节关于阳明学的论辩及其意义——以许篈与袁黄为中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0辑，2009，第57页。

③ 有关这次笔谈的内容，原文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24-425页。以下引文不再逐条注释。

家，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后裔。

许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机会，当即与四人展开笔谈。一番寒暄之后许箬直奔主题，谈起阳明学，他说：“仆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程朱之道，蔚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愿核其同异，明示可否？”四人的回答是：“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已从祀孔庙矣。公之所闻，意昔者伪学之说惑之也。”很明显，这四人乃是阳明学的拥趸，对王阳明评价甚高，但四人提到的王阳明“已从祀孔庙”，并非事实，各种材料均显示，王阳明正式从祀孔庙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也就是十年以后的事。当时这四位生员之所有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或许是因为信息传递的误差，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关于王阳明从祀的论调已经甚嚣尘上。^①然而，当听到四人说王阳明已经从祀孔庙，及其有将朱子学斥为伪学之意，许箬马上按捺不住，展开了大段的辩驳。

许箬首先指出，朱熹乃是集圣贤之大成的儒者，后世学人如真德秀、许衡、薛瑄、贺钦等无不信服之，唯独王阳明公开诋毁朱熹，妄自更定朱熹的《大学章句》，可谓不敬。不仅如此，王阳明还说：“苟不合于吾，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然也”，又是对孔子的大不敬。许箬认为，王阳明如果生在三代之前，“必服造言乱民之诛”，同时还借用孔子的话“小人者，侮大人之言”，称王阳明就是孔子口中的“小人”。这些批评，不可谓不严厉。

同时，许箬又从学术和功绩两个方面批评王阳明。学术方面，他指出阳明学不过是将佛学思想改头换面后的假学问，在内行人看来尽是破绽，而王阳明的论著文章更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至于所谓的功绩，他认为王阳明之所以立下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的军功，不过是仰仗皇灵庇佑，以及因为有朱宸濠心腹刘养正（王阳明门人）为内应的缘故，胜得并不光明正大，因而，当年嘉靖皇帝对王阳明“革其爵禄，明其伪学，以榜天下”，才是真正的明见。

随后，许箬回到王阳明从祀的话题，称王阳明如若从祀孔庙，孔夫子

^①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建议最早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被提出，当时王门后学耿定向疏请阳明应“复爵赠谥，从祀孔庙”，从祀孔庙被以“世代稍近，恐众论不一”驳回，但“复爵赠谥”得以实现。同年，魏时亮又提出“请祀先臣薛瑄、陈献章、王守仁”，此后朝廷内部就阳明从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反复争论。详见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汉学研究》第29辑，第156-157页。

“必羞与之同食”，而其结局也一定会和王安石、王雱父子配享孔庙一样，最终落得被扫地出门的下场。同时，他还不忘告诫四人中那位吕祖谦的后孙吕冲和：你的先祖与朱熹一道力排陆九渊的心学，你非但不能坚守先祖的立场，反而支持阳明学，实在应该感到愧疚。最后，还不忘说一句：我说话太直，恐怕有伤交情，还请你们见谅。

听到许箴这番严词辩驳，四名生员并不相让，答复道：“从祀孔庙，乃在朝诸君子舆议，非山林僻见也。且学以良知良能为说，非有心得者，其孰能知之，所闻不若所见之为真，诸君特未之察耳。”意即王阳明从祀孔庙之提议，并非少数人的想法，朝廷和学界上层支持者亦大有人在。且对于一种学问来说，要评价它的好坏，首先要真正了解它，不能道听途说。大体上，他们是认为，许箴之所以对阳明学有偏见，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了解其真谛。许箴自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又与其反复争论，但始终无法说服对方。

许箴认为，这四个生员“固滞鄙贱，不可与辩”。于是最后一纸书曰：“承教不胜缺然。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宗朱门，君耽王学，尔月斯迈，吾日斯征，终无可望于必同也，奈何奈何。今日已昏暮，不得稳讨，明若临陋，则可以从容。”至此，双方不欢而散。

来到中国后的这第一战，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一向自命不凡的许箴相当郁闷，只能靠一番笔下牢骚来排解，再加上这个时候许箴并没有意识到王阳明从祀孔庙只是一个假消息，因而有一种伤心欲绝之感。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此非细故也。”

事实上，许箴生出这些想法有些反应过激，毕竟他听到的只是几个年轻的书院生员的片面之词，远远不能代表当时明朝学界的整体情况，何况阳明从祀是否属实还应进一步确证。然而，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许箴当时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动辄发出极喜极悲的慨叹，倒也可以理解。

（二）与国子监生叶本谈阳明学^①

许箴日记中记录的第二次与中国士人的阳明学笔谈，发生在农历八

^① 有关这次笔谈的具体内容，原文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44-446页。以下引文不再逐条注释。

月初二日，对方是一个叫叶本的人。当日，许篈等人正在从蕪州前往通州的途中，在路上偶遇叶本，打过招呼之后觉得此人“气象颇雅驯”，于是邀请其在路边坐下笔谈。许篈记载，叶本是国子监生，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

显然，许篈还是十分纠结于王阳明从祀一事，因此再次遇到中国的读书人，马上就要打听这件事。在互通姓名之后，许篈马上就问了叶本这样一个问题：“今闻王阳明从祀文庙，而命其裔袭爵云，未审此事定于何年，而出于谁人之建明乎？乞详示。”叶本回答：“今年，浙江巡按御史论其学真足以得往古不传之秘，宜从祀孔子庙廷。圣旨谕礼部，尚未覆。”

从这一问一答可见，自正学书院四生员向许篈传递王阳明已从祀孔庙的错误消息后，许篈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既定事实，他现在只是希望从叶本处了解具体是什么人提出阳明从祀的建议。而据叶本所言，关于王阳明从祀的建议，目前还只是在礼部搁置着，并没有形成定论。叶本是国子监的监生，他的消息应该比正学书院四人更为准确，因此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的消息，许篈表示“良自慰幸”，心情相比之前宽慰了一些。不过，许篈最终确定王阳明没有从祀孔庙真正放下心来，是在他到了北京并亲自确认了国子监内的孔庙从祀布置以后。^①与此同时，因为感觉叶本话语中对王阳明的肯定评价，许篈又开始用大段论述向其申明自己反对阳明学的立场。

许篈批评王阳明的意见无非两点：其一，他再次强调王阳明“如其不合于吾意，则虽其言之出于孔子，吾不敢以为信”一语是对孔子不敬；其二，他就王阳明为世人所推崇的良知说展开针对性讨论，他认为，良知本就存在于天地间，要得到良知，唯一的途径是不停地向外部世界学习，而王阳明主张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向内心世界寻求良知，这套理论其实是佛家的思想，不足为训。

叶本听了许篈的观点，不卑不亢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就许篈对王阳明良知说的批评，叶本引入了“良能”的概念来阐述，他认为许篈觉得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佛学思想，大概是因为王阳明在论述“良知”的时

^① 当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许篈等人参观国子监，并拜谒先师庙，当时他和同行的赵宪二人分头审视了东、西庑的从祀情况，并确认其中确实没有王阳明的牌位。参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56-457页。

候没有太多谈到“良能”。叶本说，良知是根本，良能是途径，关键是要明确获得“良知”这一根本目的，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王阳明的良知说，核心是强调人要有获得良知的意愿，至于他的从内心获得的方式，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途径选择，再说王阳明也不是只用内心来解决问题，他毕竟也通过外在努力建立过很多政治功绩。若要真以禅学论之，则所有的东西都是虚无的，连目的本身都应是虚无的，而王阳明有明确目的即“致良知”，所以其学说与禅学不同。叶本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要识阳明，须于其似禅而非禅者求之。”即要真正理解王阳明高明的地方，恰恰应该从他的由内心致良知这一似禅而实非禅的观点入手，《中庸》有“诚则明矣”，即经由内心的真诚可以明白道理，王阳明是用一种禅宗方式来比拟这种向心求取真知的途径，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其次，对于许筠认为王阳明不敬孔子一说，叶本的看法是，王阳明只是在文字表述上用一种极端打比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相信真理更甚于权威的意思，而绝没有从情感上不尊重孔子的意思，孟子也曾说过“圣人复起，必从吾言”这样的话，难道也要说孟子对圣人不敬吗？因此，不能只看一句话的表面意思就轻易下王阳明不敬孔子的结论。总的来说，叶本是在为王阳明辩护，他本人应该也是一个王阳明的拥护者，他与许筠辩论的态度相当谦和，说的话都还算中肯。可是，这些话非但没有让许筠的固有想法产生丝毫动摇，反倒招来后者的大段驳斥。

许筠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摒弃了一切外在事物，包括古今圣贤书本的知识，只留一个想象中虚无的“良知”，并希望以一种顿悟的方式达到它，这和孔孟关于“博学致知”的训诫背道而驰，完全掉入了佛学的唯心论之中。以前陆九渊也曾经有过“顿悟”的说法，遭到朱熹的激烈排斥，现在阳明学其实是想将陆九渊顿悟说系统化，比陆九渊更加危险。最后，许筠又谈到王阳明对朱熹大不敬的问题，提到王阳明随意篡改《大学章句》诋毁朱熹学问，并且举出王阳明雕刻朱熹像置于左右，读朱子书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就杖打朱熹像的恶行。

王阳明杖责朱熹像的传闻，不知出自何处，但许筠之意是批评王阳明不但学问不行，人品更坏。归根结底，许筠或者说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反对阳明学，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王阳明触碰了他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朱熹。许筠等人和叶本的这一次路边笔谈，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继续下去，按

照许篈所说，他们原本和叶本约好到通州以后再见面详谈，而许篈也期盼着叶本来访，但叶本不知何故没有再出现，令许篈颇感遗憾。^①

（三）与举人王之符对谈^②

在路遇叶本的当天晚上，许篈等人在通州宿处结识了一个叫王之符的陕西人，当晚未及详谈。第二天下午，许篈等人拜访王之符并与之交谈，这也是许篈日记中记载的第三次与中国士人的阳明学交流。据许篈记载，王之符，字国瑞，号觉吾，是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乙卯（1555年）举人。

在和王之符的对谈中，许篈首先问：陕西人都尊崇哪些圣贤的学问？王之符回答：皆尊孔孟程朱之道。许篈又问：近世有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学问，和程朱之学不同，陕西有人推崇这些人的学问吗？对此，王之符回答：“陆子静是禅教，王阳明是伪学，吾地方人则皆辟之矣。”这是许篈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士人称阳明学为伪学，于是他又进一步追问其对王阳明良知说的见解。

王之符对良知说的答复相当笼统，不似叶本那样有学理性的阐释。但他引了一则王阳明惧内的传闻，以圣贤岂有不能刑家之理，来推论阳明学多是一些表面文章。将王阳明的惧内和其学问建立联系，似无道理，大概是王之符此人老到油滑，借机调侃王阳明其人其学。此外，王之符还给许篈提示了一个王阳明从祀建议出现的背景，即王阳明的弟子现在多有在朝为官者。同时他也告诉许篈，朝廷中反对王阳明从祀的声音同样不少，故此事一再搁置。

对于一个同样持反对阳明学立场的人，许篈没有与之辩论的必要，也没有什么可进一步追问之事，他转而询问一些有关中国学人的情况。王之符也向许篈问起朝鲜学界的情况，主要是问朝鲜有没有心学者的问题。对此，许篈甚至没有回答有或无，直接向他介绍起了朝鲜儒学发展的历史和重要人物如郑梦周、金宏弼、赵光祖、李彦迪、徐敬德、李滉等，言外之意是说我们朝鲜只讲理学，根本没有心学的立足之地，更不用提有没有心学者了。而王

① 许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是日，叶本不至，其有故也欤？”，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48页。而在另一当事人赵宪的日记中也这样记载：“约（叶本）于通州再话，故止而不讲，卒不遇焉。”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4卷，第371页。

② 本次对谈的内容，原文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卷，第447~448页。以下引文不再逐条注释。

之符大概也明白了许篈的态度，他顺着许篈的回答，继续问起现在在世的儒学者有哪些，而没有继续纠缠朝鲜心学的问题，许篈则介绍了成运、李恒和卢守慎等朝鲜学者的情况。最后，许篈还用一句话总结了朝鲜儒学的发展与中国儒学的关系：“中朝列圣以正学倡天下，故虽以我国偏小之壤，而亦得与于斯文之盛也。”^①

无论如何，与王之符的对谈，给许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方今人人皆推王氏之学，以为得千古之秘，而王之符独排之，可谓狂流之砥柱也。余行数千里，始得此人，岂非幸哉。”可见，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对阳明学的态度问题上，经过与正学书院生员和国子监生叶本的交流，许篈大概悲观地感受到阳明学在中国似乎相当流行，难免心有戚戚焉。而在遇到王之符后，他总算看到中国仍有人坚持捍卫朱子学，自然就生出千里之外遇知音的感慨。

在这次谈话之后，许篈的日记中再没有出现与中国士人长段交流的记载。这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到了北京之后开始忙于官场应酬而无暇他顾；二是朝鲜使臣到了玉河馆后，行动受到一定限制，能遇到中国士人的机会也不多；三是毕竟到了天子脚下，这时许篈等人大概也意识到需遵循“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的礼数；而及至返回朝鲜的途中，则是早已归心似箭了。

余 论

许篈 1574 年的这一次使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学术考察，而其主要的考察对象，就是当时中国和朝鲜儒学界存在的最大差异——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考察的结果总的来说令他十分纠结：一方面，他看到阳明学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支持群体，朝廷政要中有阳明门人，学院生员中不乏其拥趸；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明朝士人对阳明学的态度存在对立，理学者仍在极力拒斥之。此外，他还发现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呼声已经很大，看来已经是迟早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许篈能做的并且也是他努力做了的，一是在和中国士人的交流中，极力贬斥阳明学的伪学和异端性质，以尽自己维护理学正统的义务；二是尽可能将相关的信息

^① 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 58 页，第 447 页。

加以详细记录，以使本国士人知晓。

许篈详细记录下自己与中国学者的对谈内容，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把一部分中国下层士人对阳明学的真实看法传递给了朝鲜士人，也把中国下层士人中不乏阳明学的支持者这一现状告诉了朝鲜士人。在此之前，阳明学主要是以书籍流通的形式传到朝鲜，而类似这样一些鲜活的观点和明朝阳明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朝鲜获得的情报并不多。而许篈的大量记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仅是朝鲜朱子学支持者借以批评阳明学的文献素材，也是朝鲜对阳明学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了解阳明学、深化对阳明学理解的重要资源。有意思的是，许篈有一个成就更甚于他的胞弟许筠（号蛟山，1569～1618），恰恰是朝鲜最早的阳明学爱好者之一。尽管这有些讽刺，但或许也并非偶然，许筠本人虽亦有出使中国的经历，有机会亲自接触阳明学，但早年阅读兄长的著作，是否引发了其对阳明学最初的兴趣，也未可知。而像这样一种影响，或许正是这次交流过程产生的意外结果。

朝鲜为何如此尊崇朱子学说而极力排斥阳明学？张崑将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这或许和一种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有关，他将这种“文化正统意识”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相联系，认为当时朝鲜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旦“中华”“不华”之后，朝鲜就要肩负起“华者”角色的使命感，所以才要极力维护朱子学这一“中华正统”，^① 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见解。笔者同时也认为，这个问题大概还可以在朝鲜儒学思想的内部找到答案。在朝鲜的儒学发展史上，道统或者说正统是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支撑整个朝鲜儒学体系的基石，更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也延伸到社会其他各个层面，是一种笼罩性的观念。而就儒学本身来说，朱子是正统，阳明是异端，如果允许这个异端动摇正统，则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儒学这一基石开始，维系朝鲜社会的整个架构亦会随之逐级崩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朝鲜儒者极力排斥阳明学的背后，也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正统或者说道统根基被动摇的哪怕一丝风险。

最后，尽管我们从许篈的记载中看到那一时期的中、朝儒学交流中尽是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场面，而非心平气和、互相理解、彼此包容的融融景象，但如果我们将时间段拉长一些来看，就会发现朝鲜的固执与偏见也并非一直持续，后来朝鲜毕竟也出现了南彦经（号东冈，1528～1594）、许篈、

^① 见前引《韩国文集丛刊》第58页，第79～80页。

李睟光（号芝峰，1563～1628）等阳明学的爱好者，最后也出现了宗主阳明学的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0）和江华学派。^① 一些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被时间解决了。儒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在共享同一个儒家文化传统的东亚，其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想象。然而，这种复杂并非没有脉络可循，在共性与差异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牢牢把握住共性，客观地面对差异、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不断地交流达到相互受容，最终还是能够寻求到儒学作为普适性文化资源的价值的。

Viewing the Exchange of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through a Debate on Yangming Doctrine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in the End of 16th Century

—Based on Korean Scholar Xu Feng's Book *Chao Tian Ji*

Wang Xinlei

Abstract Confucianism was born from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n developed to a shared resource of thought for the East Asia countries as well as derived different culture features in these countries. There is a complicated relation among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of East Asia countries. If we can catch both the difference and commonness of them, we can understand it better. This article uses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Korea to talk about a debate on Yangming's doctrine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in 1574, and shows the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which tells that through exchanges we can reach acceptance, and it lead to 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as a universal culture.

Keywords East Asia; Confucianism; Yangming's doctrine; Xu Feng; debate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scholars

① [韩] 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韩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59～171页。